

← (上接13版)

和砚滴等小件入手,日积月累,收藏范围逐渐扩展到包括景泰蓝、漆器、瓷器、玉器、佛像、朝珠、竹木雕、鼻烟壶、古旧家具在内的几大类,以至于有专家误以为我这些藏品是得自祖上所传。其实,这些收藏是远远不能跟祖父的藏品相提并论的。在我们家族的收藏史上,如果能附先祖父骥尾以传,我就喜不自禁了。祖父在藏品散失以前,编就了《善斋吉金录》等书,至今仍深受学术界称誉。近些年我也效仿祖父,努力将自己的藏品编书出版,供社会利用,主编有《和乐堂丛书》,业经出版多种,连同正在编纂的《小校经阁遗芬》,都投入了我的精力、财力,我的心血。

由于《善斋吉金录》重印本的缘故,我自1998年夏与刘鑫龄相识之后成忘年交,常有往来。2016年7月16日,刘鑫龄与我谈起拟将所藏、所见刘体智先生收藏事业的相关文献汇为一编,以表彰其祖父的道德文章,并给我了一份他整理的所藏先祖文献目录,希望我能够具体负责此事。由于当时我正值所主持的国家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的研究面临结项的关键阶段,难以分身,于是与刘鑫龄商议推举一合适人选。承担此事需要有诸多条件,一是要熟悉甲骨金文和近现代学术史并对此有兴趣,二是要能辨识尺牍等文献中的篆草字体,三是要善于与学术出版界进行交流沟通,四是要在近年中集中一段精力和时间,五是要为人诚信仁厚。我想到了年轻同事张涛,经与他商议后,2016年9月1日,我们三人正式见面并就《小校经阁遗芬》编辑出版事宜进行了具体讨论。从2016年9月至2018年5月,我们在刘家一起讨论《小校经阁遗芬》编辑出版事宜不下十多次。其间,张涛对所收集的文献进行了逐一的考校和注释,并曾先后专程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机构查阅相关文献,得到了这些图书馆的鼎力相助。而刘鑫龄也因整理出书过度劳累,于2017年4月病倒住院,在医院和家中休息了数月之久。《小校经阁遗芬》中凝聚了他们二人多年的心血,体现出对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的热情和执着,令人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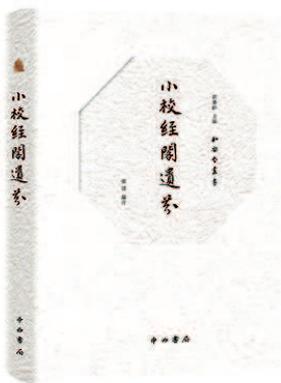
《小校经阁遗芬》所收文献包括私人书札、公牍、文件、书画以及刘体智旧藏甲金选样,而以书牍为主,内容皆与刘体智交游、收藏事迹有关,故统名之《小校经阁遗芬》。遗芬意指后人感怀前辈留下的盛名美

德,宋儒朱熹诗云:“悬知千载下,此地想遗芬。”清朝《海山仙馆丛帖》中有《尺素遗芬》,即是潘仕成故交知友的来往书信,近代出版家王云五作序的《王氏遗芬录》则是家族文献。今此书命名为《小校经阁遗芬》,对刘氏家族而言,实是恰如其分。明朝大学士李东阳为湖州闵氏聚芳亭补书亭扁,并为其家传的交游聚会吟咏诗卷《聚芳亭卷》作跋,有“诗书图史,遗芬剩馥,在其子孙者,其来未艾”之语,并极口赞叹该卷的收藏保存者闵珪之“贤”,后来的王世贞也称誉闵珪为“能世业也”。今《小校经阁遗芬》出版,刘鑫龄可称“能世业”,而刘氏一族的家风也应“其来未艾”吧!

此书中所收资料原件,大多为刘鑫龄所藏,也有一些为公共机构的相关文献,包括刘体智与容庚(1894—1983)、罗振玉、徐森玉(1881—1971)、尹石公(1888—1971)、唐兰(1901—1979)、陈梦家(1911—1966)、胡厚宣、郭沫若等的来往信札。全书图、文分排,其中文字部分先释文,次简注。书后“附录”中收入相关文章数篇,可藉以了解刘体智的收藏经历及藏品价值。《小校经阁遗芬》将珍贵历史文献公之于世,其出版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的资助,真是可喜可贺。

刘鑫龄在编完《小校经阁遗芬》后,整理收藏文物的热情不减,他在《小校经阁遗芬》序中写道:“我现年85岁,体弱多病。我这些藏品也确实来之不易,其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历史。在有生之年,我还想为弘扬祖国的优秀历史文化多做些贡献。今后,我还要将重要收藏品分门别类,如唐以前的石雕佛像、唐卡、内画、鼻烟壶、料器、象棋等,请我志同道合的朋友摄影、编辑、出版,供广大爱好者赏析。”字里行间,折射出上海这座城市中众多文化人的精神品质和生命追求。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吾辈二十余年旧交”

——信札中的刘体智与容庚

林锐

与同时代的张珩、叶恭绰、吴湖帆等一直受到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庐江刘体智先生尽管也属民国时期顶级的收藏家,却不为世人所熟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究其原因,当与学界对其个人生平及收藏的史料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有关。由刘者龄先生主编的《小校经阁遗芬》一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遗憾。该书收录了目前所知公私收藏的有关小校经阁主人刘体智先生的主要文献,包括其与友人及相关机构往来函牍、档案文书及相关藏品照片、题赠诗词等,以影印加释文的形式出版,并附以整理者简要的考证与注释,为我们了解这位收藏家的交游及其收藏的品类、规模及藏品去向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民国收藏家群体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本书所收文献中,以刘体智先生与东莞容庚先生来往的信件及有关资料数量最夥。单就往来书信论,共收录两人往来信件59通,其中刘致容14札(最后一札为底稿,残),容致刘45札,此外,尚附有与二人相关的藏品照片、目录资料等。这批信件的写作历时二十余年,几乎见证了刘、容二人交往的全过程。而其内容也极其丰富,上至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下至日常生活琐项,皆有涉及,而更多的则是与收藏有关之事。

刘、容二位先生,皆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收藏家,也是有名的学者。就收藏而言,刘先生堪称民国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诚如容先生所言:“如言民国间之收藏家,魄力之大,方面之广,以公为第一,亦足自豪。非第一人之私言也。”(容致刘第35函)其所藏品类丰富,量夥质精,尤以青铜器及殷墟甲骨为大宗,一时无俦。其撰述也颇丰,除了整理本人藏品成果如《善斋吉金录》《校经阁金石文字》等外,还有《元史会注》《异辞录》《说文谐声》《书画鉴影》等多种著述。容庚先生则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古文

字学家、青铜器专家等,其《金文编》及《商周彝器通考》为金文及商周青铜器研究的经典著作,影响尤其深远。而其收藏范围以青铜器、书画碑帖等为主。两人在收藏方面有着共同的爱好。但相对而言,两人的收藏家与学者的身份实际上是各有侧重的:就收藏而言,刘的收藏规模和质量远胜于容,而就学术成就和影响而言,则是容远高于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刘、容二人之间就是一种收藏家与学者间的关系。两人的这种各有长短的特点,正好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也正是这种互补关系,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二人的早期交往。

容、刘二人的交往,始于1931年。其最初的交往,各家说法不一。周明泰跋沈子伦所藏古器图录于行篋,出以相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西白兄尤称赏此器,谓铭字多至百余,古茂精美,为向所希见。兄真正法眼藏哉!”而容氏本人在《善斋彝器图录序》则自述:“庐江刘体智先生收藏经籍书画金石之富,海内属望久矣。民国二十年春,获观《善斋吉金十录》稿本三四十巨册于秋浦周明泰先生家。其中未著录之彝器可二三百。余方欲增订《金文编》,睹此异文,振荡眙愕,欲效米襄阳之据船舷也……乃告明泰曰:‘余与刘氏未谋面,不敢多求,如能以沈子篋盖拓本见贻,感且不朽。’久之,刘氏邮赠拓本,贻书定交。赏析疑义,邮简渐密。”《小校经阁遗芬》所收刘氏在当年6月12日致容氏第一函,是在收到容氏来信及所赠拓片后的复函,其中言及“敏求津平之役,把臂班荆,可偿渴愿,迺竟参差相左,挈挈役,殆同情乎!”可见两人在此之前确未谋面。而信末又称“沈子伦盖铜质易损,现觅好手精拓,不过十纸八纸,分赠知交,容续寄奉。”同月29日刘氏第二函中提到“沈子伦盖已摄就,附函奉上”,可见容氏获赠沈子篋盖拓片

的时间当在此时,而刘氏“久之”方贻赠容氏此拓片的原因,当系须倩良工精拓所致。而在此之前,刘氏曾托人(很可能即是周明泰),商托将其《善斋吉金录》交由燕京大学出版:“有友人以惠之所著《善斋集古录》托转燕大代印,共彝器、镜、印等四十余册。”(1931年5月19日容庚致郭沫若函)。《善斋集古录》就是《善斋吉金录》。是年8月,容氏趁学校放暑假之机,与徐中舒、商承祚等到了上海,两人才得以第一次见面。以上是两人最初交往的一些情形。此后两人的交往由编纂刘氏藏品图录、藏品研究、资料交换而渐及其他方面,并成为知交。

客观而言,刘、容二人的交往,起初难免略带些许的功利色彩。刘氏丰富的藏品对从事金文和青铜器研究的容氏来说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刘氏编辑出版自己的藏品图录,则似有借重容氏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地位及学术成就之处。但在此后,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直至暮年。容先生写信给刘氏,深情地说:“回忆吾辈二十余年旧交,所存无几,弟亦年过六十,头发斑白矣,犹幸顽健,能乘自行车奔走于广州与康乐之闲,想公闻之,当亦一笑也。”(容致刘第34函)这一年容先生62岁,刘先生较容先生年长15岁,这时已经是77岁高龄了。两人关系的发展,为后人树立了朋友交往之道的一种典范。

晚年的容、刘二位先生彼此系念,相互照应。刘先生一度想迁居岭南,容先生“为吾粤文化计,固日盼公之来”(容致刘第19函),并忙着张罗住处。刘先生年老患病,容先生十分关心,曾替他求医问药,还帮他联系买家收购藏品,以缓解刘家经济上的压力。而刘先生则对容先生报以厚赠,他投其所好,1948年,刘体智赠送容先生多件书画,包括林良《秋树聚禽图轴》、张锦芳《临汉周憬碑

(下转15版) →